

錢穆 学术文化九讲

► 钱穆 讲述
► 叶龙 记录整理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錢穆

学术文化九讲

□ 钱穆 讲述 □ 叶龙 记录整理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穆学术文化九讲 / 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 —
成都：天地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455-2832-9

I . ①钱… II . ①钱… ②叶… III . ①文史—中国—
文集 IV .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9453 号

钱穆学术文化九讲

出品人 杨政

讲述 钱穆

记录整理 叶龙

责任编辑 杨永龙 朱迪婧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55mm×22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45千

定 价 39.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832-9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钱师宾四先生这本讲演集一共收录九篇讲演稿。

《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和《中国散文与中国文学史》是钱师在新亚书院所作学术专题演讲。当时每有钱师讲座，从校内外赶来的听讲者为数甚众，不及钱师到场，教室已被听讲者填满，以至于钱师每每须拨开人群辟出一条通道，方能走上讲台。足见钱师讲学之盛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钱师在书院大学部开设多门课程，包括讲庄子、讲秦汉史以及中国通史等。《秦汉政治得失》和《〈庄子〉导读》即为我当年选修“庄子”和“秦汉史”课程时

所做筆錄。

《魏晉南北朝思想文化綜述》是錢師為香港大學校外課程所講，一共有四講，時間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

又，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曾邀請錢師作歷史專題系列講演，共八次，《中國經濟史的特點和研究方法》即是其中之一。當時由我為諸次講演做筆錄。《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意義與方法》和《中國學術傳統的精神》同出于上述系列講演。本次選輯錢師講演集，也一并選入，以充實之，方便讀者了解錢師治學旨趣。

在香港之外地區所講則是《中國歷史上的人物》一篇，是錢師在台灣的臺南成功大學所講。當年成功大學初設歷史系，錢師應羅校長之邀，講了一系列歷史專題，上題即是其中之一，當時一共是四講，此處僅選錄其一。

九篇講演，字數已過十萬。足以成冊。

我早年親炙於錢師門下，受益無數，深慕錢師學問及做人，亦以弘揚錢師學術思想為志願。早前我已將錢師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講稿《中國經濟史》交由香港一出版機構出版，簡體字版亦於2014年由北京後浪出版公司出版。之後，我繼續整理錢師《中國文學史》和《中國通史》兩部講稿，其簡體字版由新華文軒（天地出版社）先後出版。兩書甫出，即備受各界讀者關注，此亦在意料之中。本書則專從學

术文化角度选辑钱师早期讲演，以期令读者对钱师之学问有一感性直观之了解，亦可偿钱师传扬学术思想于内地之夙愿。

《深圳商报》读书周刊主编刘悠扬女士为本书的出版多次来港联络，出谋划策，在此向她表示万分谢意。

我已入耄耋之年，体力时有不济，唯承继吾师传播、护卫吾国文化精粹之遗志片刻不敢有所懈怠。全书如有疏误，当由我负责，祈读者不吝赐正，即一字之改错，亦吾师也。

是为序。

叶 龙

2017年2月8日于香港青衣寓庐

吟徵調高竚下桐
松間疑有入松風
仰窺低窻含情竇
以應無涉一弄十

目 录

序 / 01

中国儒家与文化传统 / 001

讲到中国文化，便会联想到儒家学术。儒家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谁也会承认。

中国散文与中国文学史 / 039

散文史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有关，即由散文史而文学史，进而中国文化史。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 / 071

读历史定要懂得人物贤奸，这是中国人一向极端重视的一番极大的大道理，也可说是中国人在人文学上一番大发明。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 097

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



以聽無妨一耳十
自序謹題

中国学术传统的精神

/ 115

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
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

中国经济史的特点与研究方法

/ 135

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的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
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

秦汉政治得失

/ 155

殷周实不能称为统一之大帝国，特诸侯只举一
共主耳。秦为一统之始，然在行政上，一方面无社
会基础，一方面制度始创，兼又暴起兴作，故十多
年而亡。汉兴与秦困难同，故只能因循无为。

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综述

/ 181

魏晋南北朝人于经学极重《礼》，于史学则极
重人物。要之，乃是重视人生。

《庄子》导读

/ 227

我认为《老子》与《庄子》，亦是人人必读书。
因儒、道两家已有二千年历史，对中国影响最深最久。

中国儒家与文化传统



讲到中国文化，便会联想到儒家学术。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谁也会承认。但现有两个问题须讨论者，其一为儒学之内容，即儒家学术究竟是什么；其二为中国文化中其地位之比重究竟如何。

吾人对此二问题当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作说明。因此本讲范围乃系有关中国文化中之中国学术史部分。而在学术史中，又专就儒学史为本讲之题材者，唯如此讲法已嫌范围过宽，又且中国儒学史一题，亦向未有人来对此做过系统之研寻。

本讲演则可谓对此问题作一开头，但所讲范围牵涉已甚广。又属开始探寻，自有许多观点，既是一向无人提出讨论，在此讲座中只是把此许多观点提出，并无定论可言，以待此后继续有人就此纲要而探讨，再隔些时可有一部中国儒学史出现。这却是一项饶有意义与价值的事。

要讲儒学内容，必须讲到儒学史。此即中国儒学之演变历程。

历史上任何事物，传递久远的，必有其一番演变历程。儒学自孔子以来流传迄今，已逾两千五百年，自然有许多演变历程可讲。

要讲演变历程，必先划分时期。此下将儒家演变姑试划分为六个时期。

关于儒家之第一期，即儒学之创始期，此在先秦时代。自孔子起，下及孟子、荀子，以及其他同时代儒者均属之。

此一时期百家争鸣，儒家不仅最先起，而且亦最盛行。《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又说：“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可见当时儒学之盛，亦可见在中国学术史上，儒学一开始便已与众不同，值得我们之注意了。

接着儒学之第二期，此为两汉儒学。我姑名之为儒学之“奠定期”。也可说，儒学自先秦创始，到两汉而确立，奠定了此下的基础。

有人说先秦学术至汉代已中断，或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而儒学定于一尊。此两说均有非是，其实儒家在晚周及汉初一段时间内，已将先秦多家

学说，吸收融会，共冶一炉，有意组成一新系统。故说先秦各家学说，到秦代统一已中断，并对此后历史无影响无作用者，实是一种无据臆说。至谓汉后学术定于一尊，此说之非，待之后再提。

今讲两汉儒学，亦可说此时代之儒学实即是经学。只读《史记》《汉书》中之《儒林传》，便知凡属儒林，都是些经学家。而凡属经生，也都入《儒林传》，此下二十四史中，凡有《儒林传》的，莫弗如此。故说经学即儒学，此说乃根据历史，无可否认，而尤其在两汉时为然。我们也可说中国儒家则必通经学，不通经学则不得为儒家。如此说之，绝不为过。

现在试问，为何儒家则必通经学呢？此即就先秦儒家言，如孔、孟、荀诸人，他们所讲，即多是《诗》《书》《礼》《乐》，属于所谓经学范围，两汉承孔、孟以下，续此一传统，故成经学即是儒学了。

其次论到两汉儒学对当时之贡献与作用。我们当说两汉时代一切政治制度、社会风气、教育方法及私人修养等，种种大纲大节，无一非根据经学而来，故可说两汉经学实对此下中国文化传统有巨大之影响与贡献，此层实在无可怀疑。唯涉及经学内容处，已非本讲范围，今姑不论。

兹再说及儒学之第三期，此指魏晋南北朝时期言，我姑将名之为儒学之“扩大期”。有人听我此说，或将觉得奇怪，因大家习知魏晋南北朝人崇尚清谈，老庄玄学盛行，同时佛学传入，儒家在此时期，特见衰微，何以反说它为儒学之扩大期？

诸位当知，我此所说，亦以历史事实作根据，一辈讲历史的，不免忽视了魏晋南北时期之文化演进，而只把政治形态来衡量全时代，而误认为此一时若无文化学术可言。其实此一时代之儒学，虽不能如佛学、玄学之盛，而较之两汉儒学，亦非全无演进可言。

首先且说此下的《十三经注疏》，此属中国经学上之一大结集。而《十三经注疏》中，成于此一时代人之手者却已占了一半。如《易》之为魏王弼注，《论语》之为魏何晏集解，《左传》之为晋杜预集解，《谷梁》之为晋范宁集解，《尔雅》之为晋郭璞注。至于《尚书》孔安国传，至今称之为“伪孔传”，实非出于西汉时代之孔安国，而系出魏晋时人所伪托。其作伪者，或说是王肃，亦有人说乃东晋时另有人名孔安国者为《尚书》作传。无论其究竟如何，《尚书》伪孔传成于此一时代人之手，则殆无疑义。故全部十三经注中，由魏晋人作注者十占其六。且《尚书》有伪古文，在此下中国学术

史上影响亦大，乃亦为魏晋时人所伪作，则此一时代人之经学，其与汉儒相较，得失如何暂不论，而其对此下儒学之影响，则断不该轻视可知。

并在此一时代之经学中，又特创有义疏之学，惜至今都不传，仅有皇侃《论语义疏》一部，此书在中国亡佚已久，清代始由日本得回。我们略可窥见此一时代人所谓义疏之学之一斑。而唐初孔颖达、贾公彥等作《五经正义》，即是根据此一时代人之材料而递嬗作成者。故一部《十三经注疏》，注之部分，魏晋南北朝所作已占其一半，而疏却占了十之八九。

又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其书创始于陈代，成书在未入隋之前。其所运用之材料，亦多出于此一时代人之功绩。

根据上述，可见此一时代人致力经学的实不在少数，而且影响于后代者亦大。

我们在今日如有意再研究经学，首先仍须透过此一时代人之经学，亦属至为明显之事。如此则何能谓此一时代乃无经学或儒学可言？

我们且试一翻《隋书·经籍志》，就其所载此一时代人对六经有关之著作之部数与卷数作一统计如下：

经籍名称	《易》	《尚书》	《诗》	《礼》	《乐》	《春秋》
现存著作部数	69	32	39	136	42	97
现存著作卷数	551	247	442	1622	142	983
连亡佚者 在内之部数	94	41	76	211	46	130
连亡佚者 在内之卷数	829	296	683	2186	263	1192

上表所载现存云云，乃指在作《隋书·经籍志》时所现存者，此等著作在今言之，则可能已大部分亡佚，所存无几。然只观上表，亦可见此一时期之经学，即论其著作数量，亦已惊人。今若即以著作数量之多寡，来作为衡量当时人对经学中某一部门之重视与否之标准，则知此时代人在经学中最重《礼》，次为《春秋》，《易》则居第三位，《诗》《书》分别占第四位、第五位。此一简单之统计，实可揭发出当时人对经学分别轻重之重大意义所在。尤其在南北朝时，经学已分为南学与北学，南北所重亦多有不同。

北人研究主要重在《周官》一书，《周官》虽是一部战国人作品，然其书提出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乃中国古代的一部乌托邦。

由于北方政治实况不上轨道，故一辈经生尤其集中钻研《周官》，俾能据以改进当时政治之实际措施。

苏绰与卢辩两人相交甚笃，同有志于作《周官》研究。其后苏绰上了政治舞台，北周一代政制规模皆其所创建。直至隋唐仍因袭此一传统，重开中国历史上之光昌盛运。卢辩为一纯学者，彼曾作《周官注》，与苏绰同样甚受当时及后世之推重。

又如北齐有熊安生，为当时北方经学大师。北周灭北齐，熊氏知周君必来相访，命童仆洒扫户庭以待，翌晨果如所言。

昔拿破仑征德国，歌德以在路旁一睹拿翁风采为荣。比之中国熊氏故事，岂可同日而语！

正因熊安生为当时讲《周官》之权威，而《周官》乃当时北方经学所重。北周即凭《周官》建制，故熊氏亦必知北周君必来相访也。

我们单凭此一则轶事，便可想知当时北方政府之重视经学，亦可见经学对当时政治上之实际贡献了。

至论南人所重，则尤在“丧服”一门。尤其是宋初¹雷次宗，为当时丧服大师，与郑玄同名一时，有“雷郑”之称，正因当时门第制度鼎盛，而此一时代之

1 編按：指南朝刘宋（420—479）。

按语共分三种：“钱按”为钱穆先生当时所解释；叶龙按语均作“叶按”；编者所加注释均作“编按”。下同。

门第制度，实为当时中国文化命脉所寄。而所赖以维系此门第制度者，《礼》之《丧服》尤占重要地位。

唐以后门第制度渐坏。此一门学问，逐渐不为后人所重，然在唐代则门第制度尚存在。故杜佑《通典》中所载，此一时代人所讲《丧服》之要点，保留尚甚多。

由于上述，可见魏晋南北朝人讲经学，其对当时时代之贡献亦甚大。实与两汉儒生之通经致用事无二致。虽在此时期中，甚多人讲究出世之佛学或讲老庄玄学，但论中国文化存亡绝续之命脉所系，则可谓主要仍在此辈儒生手中。

若果如一般人想象，魏晋南北朝人四百年来只读老庄玄学，只讲佛学出世，则试问如何能缵续中国文化遗绪以下开隋唐之盛？

故知南北朝时期，儒学基础实未破坏，而斡旋世运以贞下而起元者，亦端赖于此。此均有历史记载做证，诸位披检自知，不复详述。

然我今天所以说魏晋南北朝为儒学之扩大期者，其重点尚不在此。我以为魏晋南北朝人讲儒学，已不专于经学一门，而又能兼及史学方面来。

史学实为经学之一部分，如《尚书》《左传》均当属史学范围，唐刘知几作《史通》，分疏史书体例，即